

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同盟的評估： 歷史的觀點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生 張書瑋

提要

- 一、冷戰時期的美日同盟關係主導東亞安全戰略情勢的發展，但美日同盟關係在冷戰後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藉由其之後條約強化。
- 二、本研究將深入了解與回顧國內外美日安保的文獻以及「中」、美、日三國之間的關係，並且影響三國間關係決定性因素在於那一層面。
- 三、在時間的推移下，每個時期的美日安保條約與指針都代表著不同的轉變與意義，而其中也反映出國際局勢的變化。
- 四、在冷戰前與冷戰後中共對於美日同盟的認知，以及在東北亞國際政治環境中，有那些決定性因素影響著「中」、美、日三國之間的關係。

關鍵詞：美日同盟、美日安保、「中」、美、日三邊關係

壹、前言

冷戰結束已逾15年，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所共同建構的世界二極體系也早已成為歷史。在過去的15年中由於美國的國力仍無法有任何國家足以挑戰之，因此，在國際社會中已經確立其世界超強的地位，在亞太地區亦是如此。美國在亞太的國際政治格局中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單極主導結構，因為其在軍事、經濟、政治、科技等層面都居於絕對優勢的地位。而繼承前蘇聯的俄羅斯因為內政以及經濟的問題使得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大幅弱化，無法再與美國抗衡。相對的，日本與中共也從90年代開始，確立其亞太區域強權的角色，日本憑藉的是雄厚的經濟實力，而中共則是開發中國家經貿實力成長速度最快，經濟潛力無比雄厚，加上擁有13億人口以及廣大市場，同時也是發展中國家中的軍事強權。因此美、日、「中」這三股力量形成了亞太地區的主導力量，三方關係如

何發展？將影響亞太區域乃至整個世界的國際政治格局。如上所述，在進入21世紀之後，亞太國際政治格局的形成與區域內強權互動有很大的關係，區域內強權主要包括美國、日本、中共、俄羅斯，而此四個國家依據彼此關係的變化形成了美日「中」，美俄「中」，日俄「中」，美日俄等四組三角關係。如同前面所述，由於俄羅斯的弱化，日本、中共的崛起，使得筆者認為四組三角關係中，美、日、「中」三角互動對亞太地區新的利益關係與戰略結構的發展與走向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在美、日、「中」這三角關係中，由於美、日兩國在社會經濟背景及意識形態價值上的相近性，加上美日同盟體系條約的結構發展，因此，美日兩國的關係是較為固定的，但是在東北亞國際政治結構中，議題取向（朝鮮半島及臺海議題）與軍事安全是這區域的重要核心，因此中共如何去認知美日同盟將成為美、日、「中」三角關係如何互動的重要因素。

貳、文獻探討

一、從亞太安全層次探討「中國」的角色地位

亞太安全研究最近幾年出現了以前沒有過的大辯論，因為它觸及了亞太安全研究的根本核心，也就是亞太地區是朝向和平？還是朝向戰爭？最初挑起這個議題的是Aaron Friedberg，他的基本論述認為亞洲的冷戰結束得很慢，基本上還是相當程度存有冷戰的格局，未來還是有很多的爭端。^{註一}David Kang接著在2003年發表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導引出更多的討論，他的基本主張是：(一)亞洲國家在後冷戰時期並沒有如Friedberg及其他學者的預測，成爲一個爭端充斥的場所，西方國家的學者顯然過於悲觀，亞洲國家基本上是和平的；(二)中國在歷史上維持一個階層化的亞洲秩序，今天的「中國」再度成爲亞太的中心，一個富強、安定的「中國」可以確保安定的亞洲；(三)亞洲國家有附從於「中國」的現象。^{註二}Kang的文章相當有挑戰性，但也引發許多爭論，最具代表的是Amitav Acharya，他認為有以下幾點：(一)亞洲國家並沒有附從於「中國」，印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二)歷史上的中國不是和平的，「中國」對越南就是例子；(三)亞洲國家是害怕「中國崛起」的，基本上亞洲要維持和平，主要是經濟互賴以及區域的自主典範、機制來運作。^{註三}

此外Gerald Segal的文章分析中共的限制，指出學術界對於「中國」的角色過分誇大，這樣的分析在西方學界是比較少有的。

^{註四}Robert Ross則認為中共在先天的環境之下和美國只會維持和平的策略，因為一個是海權國家，一個是陸權國家。^{註五}David Shambaugh及Foot則是給予中共較爲正面的評價，其中強調中共的角色責任，並且從中共友善與周邊國家交往及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上，中共基本上是安全的，並且在現今的國際政治環境中，中共區域實力的增強的結果並不是就相對代表美國或其他國家在其區域內實力的減退，現今的環境並不是一種單純的零合遊戲，在許多議題及場合上還是可以追尋其共同的利益合作。^{註六}

二、從美日安保的角度

《美日安保條約》跨越冷戰和後冷戰時期，其內容的產生和延續一直受到國際局勢的影響以及美日兩國的國內政治經濟層面制約。大多數文章從美日安保條約的沿革發展做一縱向描述，其中包括每時期的條約內容以及新任務等，並且在其新內容中賦予美日兩國新的戰略意涵及功能性作用，包括1951年安保條約、1960年修正安保條約、1978年安保指南以及1997年新安保指南，以這四項文件爲建構美日安保體系的主要架構。並從美日安保的觀點，與其區域政治做連結性掛勾，以美日安保條約內容的轉變將會對區域

^{註一} Aaron L. F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3(1993), pp.15~33.

^{註二} David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2003), pp.57~85.

^{註三} Amitav Acharya,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8, No.3 (2003/2004), pp.149~164.

^{註四} 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Vol.78, No.5 (1999), pp.24~36.

^{註五} 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4(1999), pp.81~118.

^{註六} 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9, No.3(2004/05), pp.64~99, Rosemary Foot, "Chinese Power and the Idea of a Responsible State", *The China Journal*, No.45 (2001), pp.1~19.

政治及國家間安全產生影響作用為主體，其中涉及到亞太安全形勢，以及一國對另一國的外交政策行為產出做大範圍國際層次面描述。^{註七}另外也有從安保觀點探討臺灣安全問題，尤其是每一時期的安保條約的防衛範圍和臺灣問題有何互動性。^{註八}也有學者指出，美日安保體系若只是單從國際體系層面及戰略因素已經無法全面了解其轉變的原因與全貌，並且運用新自由制度主義探究美日安保條約隱含著什麼樣的政經意涵？以及美國和日本之間存在著何種制度來調節兩國之間的關係。其中不僅涉及到美日兩國的國際安全戰略利益層面，同時也必須考量到國內政經層面。^{註九}此外，也有從安保觀點看日本邁向普通國家做為主體，從美日安保條約中日本相關法案的通過，評估日本的國內政治與國際地位的影響。^{註十}

三、從三邊關係的角度

美、日、「中」三邊的關係是冷戰後才被提出的問題，特別是蘇聯瓦解後，中共在綜合國力提升之際，美、日、「中」三邊的關係取代冷戰時期的「中」、美、蘇三角關

係。而在大多數出版的相關著作中，多數是對美「中」、美日及「中」日之間的雙邊關係上做分析，此類的分析依其歷史做時間序列的描述，^{註十一}但缺乏理論的應用與檢驗。在寫作的內容上，通常以時間做為劃分的對象，並且在每一時期當中，以重要議題的方式呈現雙方關係的轉折或影響。

另外也有學者類似採用Lowell Dittmer於冷戰時期分析美蘇「中」戰略三角關係所使用的戰略三角的概念來分析美國、日本與中共之間的關係。在傳統研究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的理論中，戰略三角多用來描述美國、蘇聯與「中國」在冷戰時期的互動模式。模式中說明華府、莫斯科、北京三者的關係是相互牽連，任何一國的安全繫於另外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然而90年代以後美、日、「中」三角關係與美、蘇、「中」三角關係在結構上有很大的類似性。在這兩組三角互動中，基本上每一個行為者都是以本國的安全利益當做對外政策上最重大的考慮因素，並且清楚的認知到三邊關係彼此是相互影響的。^{註十二}學者Robert Ross亦曾撰文指出，影響

^{註七} 參考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政治科學論叢，第9期，1998年，頁275~304；曉光，「冷戰後日美安保體制的調整及其對亞太地區和中日關係的影響」，東亞季刊，第30卷第4期，頁69~90；張隆義，「從安保觀點看冷戰後日本對中共的政策」，問題與研究，第38卷第1期，1999年，頁1~15；Soeya, Yoshihide, "The Japan-U.S. Alliance in a Changing As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 No. 4 (1996), pp. 265~275; Hickey, Dennis Van Vranken, "The Reversed US-Japan Security Guidelines: Implications for Beijing and Taipei", Issues & studies, Vol. 34, No. 4, (1998), pp. 72~100.

^{註八} 宋學文，「從美日新防衛合作指針與三不政策探討臺灣對中共之安全策略」，戰略與國際研究，第1卷第4期（1999），頁21~54；楊志恆，「美日安保之沿革及其對臺海安全之影響」，戰略與國際研究，第2卷第2期，（2000），頁1~30。

^{註九} 蔡增家，「美日安保條約的政經意涵與制度的調適」，問題與研究，第37卷第9期，1998年，頁1~18。

^{註十} 葉國興，「日本邁向日美同盟下的普通國家——評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相關法案的通過」，戰略與國際研究，第1卷第3期（1999），頁43~73；張隆義，「冷戰後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與亞太安全」，問題與研究，第35卷第7期，1996年，頁1~15。

^{註十一} 張蘊嶺，夥伴還是對手——調整中的中美日俄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頁202~304；許志嘉，「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對中共政策之調整」，問題與研究，第42卷第3期，2003年，頁79~99；陳一新，「後冷戰時期美、日、中共關係的調整」，問題與研究，第34卷第6期，1995年，頁1~25。Aaron L. Friedberg, "11 September and the Futur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urvival, Vol. 44, No. 1 (2002), pp. 33~50.

^{註十二}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33, No. 4 (1981), pp. 485~516.

美、日、「中」三邊關係主要有四項因素，分別為三國的力量分配、三角當中的威脅觀、第四方的威脅觀以及外交政策的利益和衝突去評估，從而發展出三種不同類型的三角關係：(一)二對一的穩定聯盟，其中兩國合作取得最大利益，第三國想從中削弱卻難以成功；(二)穩定的三角，三國之間並無明顯衝突，雖然有可能因為利益或政策上的差異而導致問題之產生，但還不至於影響到穩定的關係；(三)不穩定的三角，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敵對競爭，彼此產生威脅或不安全感。

註五

四、從中共軍事安全層面看與美日兩國之間的關係的角度

冷戰結束後，中共在地緣戰略上進一步從內陸走向海洋，並繼續推動軍事現代化，此種態勢明顯導致美國及亞太國家的不安，致使「中國威脅論」聲浪高漲。為卸除亞太國家的安全疑慮，中共在1995年後不斷強調其國防政策是防禦屬性，企圖為軍事行為，以及軍事現代化發展做一個明確界定，但是在「中國威脅論」的影響下，註六中共與美日兩國的關係呈現圍堵和反圍堵的對抗思維上。註七

此外也有學者將安全困境理論用於分析

東北亞安全上，安全困境理論認為，在一個不確定和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系統中，兩個或多個國家因為不信任，而激起防禦性的措施，產生了攻擊性的威脅，而如何來解決東北亞的安全困境以及建立信心安全措施將成為其區域內的重點，而這情況特別適用於「中國」面對美日同盟體系的解釋。註八

在東北亞特定議題上也影響著美、日、「中」三國的關係，例如臺灣問題、朝鮮半島問題、中國中心論、美日同盟的關係、東南亞問題等，在各項的議題中存在著間接與直接的影響力。註九其中學者David Lampton指出，造成東北亞軍備競賽的主因有三項，分別是臺海情勢的緊張關係、中共及美國的飛彈防禦部署及日本正常化問題。註十

同時學者運用也同盟理論來探討美日安保和第三國的關係，Glenn Snyder指出，在國際體系中，國家為何要以結盟來維護國家安全，他以體系結構、關係、互動及單元四個環境要素，來觀察同盟的形成和運作，首先Snyder認為國際體系是屬於無政府狀態，在安全競逐的體系中，國家為了增進自身的安全，向外尋求結盟或建立合作關係，其安全同盟最主要的利益在於增強對敵國嚇阻力以及增強本國防衛能力；主要代價為被迫捲

註五 任曉、胡泳浩，中美日三邊關係（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4。

註六 「中國威脅論」可參考，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Mo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n",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1997), pp. 18~32, Ross Monro,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No. 62 (1992), pp. 10~16.

註七 張雅君，「世紀之交中共的軍事政策與亞太安全：防禦取向的模糊性探討」，中國大陸研究，第42卷第3期，1999年，頁25~43；陳永康、翟文中，「中共海軍現代化對亞太安全之影響」，中國大陸研究，第42卷第7期，1999年，頁1~20。

註八 林文程，「中共對信心建立措施的立場及作法」，戰略與國際研究，第2卷第1期，2000年，頁95；Christensen, Thomas J.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 pp. 49~80.

註九 Morton Abramowitz and Stephen Bosworth, "Adjusting to the New Asia",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4 (2003), pp. 119~131.

註十 Michael J. Green, "Defense or Security? The U.S.-Japan Defense Guidelines and China.", In David Lampton., ed. Major Power Relations in Northeast Asia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1), pp. 73~86.

入戰爭的可能性，限制自身的政策行動等。所以國家會在避免被拋棄及避免被捲入中這兩個「安全困境」中尋找最適點。^{註一}進而評估同盟的利益及缺點。

參、美日安保體系的演變與特徵

《美日安保條約》是冷戰時期美蘇對抗的產物，1951年9月美國與日本在美國舊金山簽署《美日安保條約》，並且它和《美韓防禦條約》、《美臺共同防禦條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共同形成遠東地區圍堵共產勢力的防線。^{註二}但初期這條約的形式內容是不對等的關係，條約主要是美國用來駐軍合法化的工具，在冷戰時期美日同盟的結構可說是穩定，但是隨著1991年蘇聯的瓦解、國際與亞太情勢的改變與美日兩國關係的發展，《美日安保條約》逐漸轉變成兩國之間關係的重要架構，雖然仍是以軍事安全為核心，但是也擴張到做為雙方經濟、政治、文化和發展議題的結構性支柱。如果以時間序列方式，美日安保包括1951年安保條約、1960年修正安保條約、1978年安保指針以及1997年新安保指針，以這四項文件為建構美日安保體系的主要架構。^{註三}

冷戰後國際安全環境的變化也影響美國東亞戰略的部署，從另一層面導致日本安全戰略的轉折性變化。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戰略是在布希政府提出的全球戰略「世界新秩序」(a New World Order)構想的基礎上確定的。

這種構想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提出了「太平洋共同體」(A New Pacific Community)概念之後被具體化，打算在亞太既有的戰略格局中，跨越地緣限制將美國勢力擴展至亞洲大陸。^{註三}在1995年2月27日美國國防部公布「奈伊報告」，確立美日安保體制是美國亞太戰略中最主要的組成，由美日聯盟所主導的海洋戰略即為美國在冷戰後逐鹿亞洲大陸最主要軸心。該報告並將未來的美日關係定義為「美國太平洋安全政策與全球戰略目的基礎」，又認為「美國的安全政策奠基於駐日美軍基地與日本對美軍軍事行動的支援，駐日美軍與自衛隊的戰力」，並且打算共同研發戰區飛彈防禦系統。^{註三}

這種想法體現在1995年《防衛計畫大綱》上，《防衛計畫大綱》重新評估對美日兩國產生威脅的事態，從過去的防止對日本小規模的有限攻擊，轉變為「日本周邊出現狀況，將對日本的和平與安全形成影響時，日本政府必須依照憲法與相關法律與規章採取適切的行動以因應」。^{註四}這就成為日後「美日防衛新指針」中「周邊事態」條文之來源。1996年4月17日柯林頓總統與橋本首相簽署「美日安全宣言」，強調冷戰後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目標從冷戰時期主要抑制蘇聯，擴大為抑制在此地區出現新的霸權國家，且保護海洋、航空運輸路線的安全以及為盟國與友邦提供安全保障，其體現的方式就是美日同盟的加強與擴大；另外，美國又

^{註一} 柯玉枝，「日本安保政策與日美同盟」，朱松柏編，新世紀亞太情勢與區域安全（臺北，政大國關中心，民國92年），頁139~164。

^{註二} 楊志恆，「美日安保之沿革及其對臺海安全之影響」，頁1。

^{註三} 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頁275~276。

^{註三} 周煦，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臺北，生智出版社，民國88年），頁38~55。

^{註三} 趙建民、何慎思，「日本外交中有關中國或美國優先之爭論——兼論日、中、臺新安全架構」，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1期，2004年，頁85。

^{註四} 邱坤玄，「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東亞研究，第35卷第2期，2004年，頁11。

認識到單獨承擔他在全球範圍的防務費用負擔過重，因此在東亞防務中具有核心地位及巨大經濟實力的日本支援是不可缺少的。^{註五}對此兩國重新確認美日安全同盟關係是亞太地區穩定與繁榮的基礎，使美日同盟的範圍從防衛日本擴大到維持亞太地區穩定與和平，為日本擴大其政治、軍事影響提供了依據。從而有了1997年新安保指針重新簽定。下列從而比較各時期美日安保條約的重要內容：^{註六}

1951年美日兩國簽署安保條約，是在許多國際與國內因素考量的背景下進行的。就當時的國際政治與區域安全而言，兩極體系浮現、共產集團的侵略（國共內戰與韓戰）使得東亞地區呈現動盪局勢，加上1950年2月「中」蘇同盟締結，6月爆發韓戰，更使美國認為在其東亞戰略形成相當大的不安全感。1951年1月，日本外務省與來訪的美國總統特使杜勒斯雙方討論有關日美安全合作的方案，並確立四項原則下的合作關係，其中最重要一項是為防止共產黨軍隊在遠東地區的侵略行為。

1960年安保條約共有10條，條文中的重點應該是在第5條和第6條，第5條規定有關日本遭受軍事攻擊時的對應方式，而第6條則是有關維護遠東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問題。第5條是針對日本「有事」時的防衛措施，新的安保條約和舊約相比較，可以看出日本在條約中角色的提升，自主性也較強，包括將日美安保條約與聯合國憲章規定連結，並且強調雙方軍事合作必須遵守日本憲法規定。

1978年的防衛指針是美日安保體系建構

過程的重要分水嶺。在這項指針之中，美國明確承諾其會在區域內「維持核子嚇阻實力，並且會前進部署(forward deployments)戰鬥部隊」。安保指針中並且明確指出，日本自衛隊將會「主要從事日本領土及其附近水域和空域的自衛性活動」，亦即日本遭受攻擊時，首先應以日本自身防衛能力擊退敵人，而如果是外來攻擊規模過大，或是其他如核武因素時，日本將與美國合作對抗侵略。這項說明其實正面確認日本自衛隊的地位與功能，讓日本自衛隊擔負防衛日本本土安全的主要工作，同時也肯定了日本在區域安全上可以此為基礎，扮演較過去更為積極的角色，而美軍則主要負責自衛隊能力之外的「輔助功能區域」(supplement functional areas)的防衛活動。

1997年美日安保新指針，在冷戰結束代表著國際與亞太安全環境新時代的來臨，做為美國亞太安全政策中主要戰略設計的美日安保體系，也同樣面臨著新環境的挑戰，而必須加以重新界定。奈伊(Joseph Nye)在擔任柯林頓政府助理國防部長時，推動修改1978年美日安保指南，以配合冷戰後亞太地區新的權力結構與安全問題。1997年底修訂完成的《美日安保防衛新指針》，一開始的宗旨目的部分就開宗明義指出包括三個主要部分：一是美日平常時候的合作(normal circumstances)，二是日本遭受軍事攻擊而「有事」時的合作(an armed attack against Japan)，三是「日本周邊」事態的因應(situations in areas surrounding Japan)。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對日本安全有重要影響的日本周邊事態的合作事項，重要內容包括強調「日本周邊」是

^{註五} 度邊治，「なぜ、いまなのかが」，憲法再生オラム編，有事法制批判（東京，岩波書店，2003年），頁33~34。

^{註六} 參考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頁275-304；張書瑋，「從有事法制立法看日本在每日同盟中的角色」，中華戰略學刊，秋季刊，民國95年，頁127~129。

事態概念，而非地理概念。^{註五}

肆、中共對美日安保關係的認知

在探討中共對美日關係的認知時，其中有幾項重要的變數我們必須澄清及理解，就是中共與美日雙方的關係並不是單面向的思考，而是呈現雙面向的動態呈現，在中共理解美日安全關係時，包含所謂的認知(perception)、力量(power)政策(policy)，也就是中共會依據美日同盟關係的發展而產生認知，並且評估其雙方的力量以及形勢，並且最後做出外交決策以其因應。而如果我們想用簡單的政治學原理解釋的話，系統論將是一個很好的解釋模式，在伊斯頓(David Easton)的系統論當中，所有具政治性質的都是政治系統的構成部分，並且認為系統的形成與力量，主要來自兩類的環境因素，一為支持(support)、一為需求(demand)，而這兩類構成政治系統的輸入項(input)，而政治系統在經由輸入後，會有一個中間轉換的過程(conversion)，而此也是一般不為人知的內幕或黑盒子，而在經由輸入和轉換過程後，系統會有一個輸出項(output)，也就是做出其決策或政策的執行。並且在政策實施對環境產生影響後，又影響對政治系統的輸入，而此稱為反饋(feedback)。^{註六}而在了解中共對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時，我們也可應用此系統論，也就是將美日安全關係當做是輸入項，而中共做為系統的本身，接受輸入項並經由

反饋而有政策輸出的過程，而中共的政策又進而影響美日同盟，又再次使得美日同盟做輸出，而整個系統達到一個循環的過程。

根據學者邱坤玄的研究，冷戰時期中共對美日安全關係的評估，大致可分為3個階段，^{註七}第一階段為建立政權到1972年與日本建交，中共將美日安全關係視為美國圍堵共產集團的一環，此時期的日本主要是做為輔助美國的角色，從1951年以及1960年的條約內容來看，在1960年的日本角色雖然相對地位提高了，自身所擔負的責任也較1951年條約內容為重，但是對於美國來說，日本是做為美國在亞太的一個重要的基地以及盟友，並且要求日本負擔更多的軍事及財務責任。進而我們在探析中共的外交政策時，在1949年-1956年階段，中共所採行的主要是「一邊倒」政策，^{註八}毛澤東在1949年訪蘇聯時，與史達林簽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獲得蘇聯經濟、技術的援助，^{註九}象徵中共在建國之初，選擇了結盟的外交政策，之所以提出一邊倒向蘇聯的政策，除了直接獲得蘇聯在建國初期的大力援助外，另一方面可視為對美國軍事的威脅、政治的孤立及經濟封鎖所做出得回應。^{註十}為了表示對蘇聯的友好，毛澤東於1950年派遣志願軍參與韓戰，與美國對抗，以示效忠蘇聯陣營。中共的參與韓戰，等於公然向美國宣戰，並澈底粉碎了美國企圖拉攏中共抗蘇的幻想，美國也轉而將中共定位為共產集團的

^{註五} 朱鋒，「周邊事態：矛盾與問題——對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和相關法案的思考」，現代國際關係，第8期，1999年，頁26。

^{註六} 呂亞力，政治學（臺北，三民書局，民國88年），頁42-47。

^{註七} 邱坤玄，「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頁4-9。

^{註八} 中共外交戰略的4次演變，分別為1950年代一邊倒、1960年代兩條線、1970年代的一條線及1980年代獨立自主外交。張小明，「冷戰時期新中國的四次對外戰略抉擇」，劉山，薛君度主編，中國外交新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頁1-17。

^{註九} 參閱顧聲毅，當代中國外交（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09。

^{註十}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臺北，聯經出版社，民國90年），頁543-551。

一員。在此認知基礎上，美國與中國大陸周邊的國家進行同盟防禦工作，而美日安保正是此一同盟的主軸核心。^{註三}而到了1956年—1960年，是「中」蘇同盟裂化的時期，其原因在於1956年毛澤東、赫魯雪夫發動貶史達林運動，並對西方世界提出和平共存的政策，1957年毛澤東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共黨大會時，批評蘇聯為反修正主義，從此中共與蘇聯的矛盾逐漸表面化。^{註四}而值得注意的是，到了1972年，中共與日本建交，而此時期美國也不斷對中共釋出善意。綜觀此時期中共對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從一開始採取敵對的態度到與蘇聯分道揚鑣，而漸漸對美日關係採取較為親近的政策。

第二階段是中共與日本建交至1982年提出獨立自主外交，中共在反蘇統一戰線的需求下，美日安全關係反而成爲對抗蘇聯的工具。但在此階段，中共與美建交後在臺灣問題並不如預期，而在與蘇聯劃清界限，也妨礙了中共與其他國家的發展，因此中共在1982年十二大提出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強調在國際上不結盟、不對抗以及不針對第三國。但此時期中共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復甦頗感疑慮，加上1978年防衛指針，日本在武裝上變成積極角色，反觀「中」日雙方問題日益加深，包括歷史教科書、光華寮事件、靖國神社參拜問題，而日本的國防預算也逐漸升高，都在在突顯中共對美日同盟的憂心。^{註五}

第三階段爲1982年之後，此時期美日安全同盟有了重大的發展，此時期也是面臨國際秩序重整的時代，蘇聯瓦解，冷戰結束，

美日同盟以蘇聯爲假想敵的基礎頓失，而在1991年波灣戰爭的經驗，也促使美日兩國重新思考定位與發展，在1997年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前，美日雙方就之前發表過幾篇重要報告，包括1995年美國東亞安全戰略報告，美國堅稱繼續維持亞太地區和平發展與穩定，並繼續在亞太駐軍；1995年日本發表防衛計畫大綱，強調美日同盟對日本安全的重要性；在1996年美日雙方更共同發表「美日安全聯合宣言：邁向21世紀的聯盟」，美國總統柯林頓與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在宣言中更肯定美日安保條約爲基礎的雙邊安全關係，其共同安全目標是維持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繁榮，之後有了1997年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的簽定。此時期中共對美日安保的評估也朝向負面的考量，美日雙方同盟關係的強化，這意味著對於中共來說是一項警訊，基本上它衝擊到中共的國家利益，以及美國和日本對中共的意圖，因此，中共對美日安保還是存在著不信任和衝突階段。

而美日安保發展在2005年2月19日有最新情況，美國與日本的國防部長與外交部長在美國華盛頓舉行「2+2安保諮商會談」^{註六}，在會後兩國發表聯合聲明，而在此份聲明中，在區域內共同戰略目標中首度列出「鼓勵臺灣海峽相關問題透過對話和平解決」，並且將臺灣海峽列爲美日安保共同的戰略目標。而在這份聲明中，可以看出具有下列意涵：^{註七}首先是美國希望日本在東亞安全領域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以負擔美國在九一一事件後除了反恐戰爭以外的區域安全責任，其次是將1997年美日防衛指針「周邊有

^{註三} 曲星，中國外交50年（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60~66。

^{註四} 參閱從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322-370。

^{註五} 同註四，頁7~9。

^{註六} 此次會談包括美國國務卿萊斯、國防部長倫斯斐與日本外相町村信孝、防衛廳長官大野功統。

^{註七} 蔡增家，「美日2+2安保諮商的政治意涵及其影響」，展望與探索，第3卷第3期，2005年，頁1~2。

事」的模糊概念具體化。而關於臺海問題也變成此次聲明各方關注的焦點，隨後中共也隨即在同年3月14日中共十屆人大三次會議上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加以回應，而美國的2005年中共軍力報告以及2006年QDR報告中，都對中共的軍力顯露出憂心的訊息，在臺海安全管控上，「美日同盟」管理臺海的結構清晰化，過去的美、「中」、臺三角架構，似乎朝向美日同盟—「中」—臺的新三角，也要把日本重新考慮到臺海問題的結構上。

此外在北韓核武危機議題上，1992-1993年間爆發第一次北韓核武危機，此危機在1994年北韓與美國簽「框架協議」後暫告一段落，北韓同意重新加入《禁止核子擴散條約》，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的監督，停止興建能生產核武所需的鈾元素之石墨式反應爐，美國並承諾負責提供北韓兩座輕水式反應爐，並在反應爐完成前，每年提供50萬噸原油做為替代能源及發電，^{註六}但朝鮮半島和平並未因此帶來保障，北韓的軍事挑釁、武器輸出的行為時有所聞。2001年美國911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小布希政府宣布北韓為「邪惡軸心」國家之一，引起平壤強烈反彈，而阿富汗戰爭爆發，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美國所展現出的單邊主義及霸權主義，更加深平壤遭受攻擊之威脅感。北韓當局決定暗中恢復核武計畫，2002年12月22日北韓承認秘密研發核武，重新啟動核子反應爐，重啓了朝鮮半島近幾年來危機升高之事件。

^{註七}並在2003年1月10日發表聲明正式退出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而為了和平解決此問題，中共、北韓、美國於2003年4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舉行三方會談，同年8月27日至29日，由中共、北韓、美國、南韓、俄羅斯及日本舉行第一輪六方會談，期間六方會談共經歷五輪，^{註八}六方會談的意涵並非在於一朝一夕地解決北韓核武問題，而在於從三方會談到六方會談的過程中，在多國政治對話的框架下，面臨和平抑或戰爭的選擇前，能透過和平對話方式探索解決途徑。^{註四}透過五輪的六方會談中，確實為北韓核武危機帶來一定的成效。但在今年(2006)7月初北韓在日本海域發射數枚飛彈，此引起日本相當大關切，學者多數指出北韓出於對美國推動六方會談的不滿，北韓想直接與美國透過談判解決，而北韓此種舉動，勢必將促使美日同盟因此議題再次緊密連結，而中共對北韓核武議題的動向將行重要。

中共對朝鮮半島的戰略觀點，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當然放在第一位，所以中共當然也希望朝鮮半島安全情勢穩定，中共認為一旦北韓擁有核武，除了將來可能遭受平壤的核武威脅，更擔心的是會導致東北亞的核武擴散，日本、南韓、臺灣也會群起效尤，且美軍勢力也會延伸至中國大陸邊界。中共憂慮一旦美國與北韓開戰，將有許多北韓難民越過邊界，竄入中國大陸東北衝擊當地經濟；且北韓一旦滅亡或被推翻，朝鮮半島統一，中共將在國家安全上失去緩衝地帶，且可能直接在邊境地區面臨美軍之部署；在接收擁有北韓核武與飛彈之統一韓國，必將激

^{註六} 朱松柏，「美國與北韓簽訂核子協議及其影響」，問題與研究，第34卷第1期，1995年，頁13~14。

^{註七} 朱松柏，「北韓核武發展與東亞區域安全」，新世紀亞太情勢與區域安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92年），頁7。

^{註八} 第一輪六方會談從2003年8月27日至29日；第二輪六方會談從2004年2月25日至27日；第三輪六方會談從2004年6月23日至26日；第四輪六方會談從2005年7月26日至8月19日；第五輪六方會談從2005年11月9日至11日。

^{註四} 沈海濤，「東北亞區域政治學研究體系的建構」，東北亞論壇，第13卷第1期，2004年，頁40。

起「中國」吉林省朝鮮族的民族主義，產生分離運動，造成「新疆獨立」問題的翻版。

^{註四}中共也擔心北韓萬一真正落入美國之手，其戰略緩衝帶將被美國侵占，因此藉著主辦六方會談，解決國際問題，扮演中間調人的角色，希望藉由對話協商的機制和平處理北韓核武危機議題，在此過程中，中共大幅改善其國家形象並提升外交地位。^{註五}

這些事件，也反映出東亞在後冷戰的格局是複雜與多變化的，未來在東亞的戰略焦點上，美、「中」、日三邊關係仍是東亞的主軸，在三邊關係中，美日兩國雖然存在不平等的關係，但是長期的聯合，使得關係變動的可能性較少，因此中共如何認知美日關係，就成為三方關係的主要變項。

伍、結 語

中共對美日安保的認知，實際上受到中共與美日兩國關係的影響，在1970年代以前，由於中共與美日兩國處於相互對抗的兩個陣營，因此中共對美日安保採取反對與批判的態度；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中共與日本、美國相繼建交，同時中共基於反蘇戰線的考量下，甚至肯定美日安保關係的功能；1980年代以後，「中」、美、日三方關係和解，中共對美日安保的關係就採取較為被動不主動評論的狀態，但後期我們可以從1997年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以及2005年美日安保聯合聲明，其中主要涉及到中共較深層的国家利益，中共原則上還是抱持著反對與批判的態度。

基本上胡錦濤上臺後，還是繼續延續江澤民主政後期的動力，在不與美國爭霸的主軸下進行不對抗、求合作的政策，此外美國經歷九一一事件後，打著積極反恐旗幟與

「中國」周邊國家如南韓、菲律賓進行反恐軍事演習，強化與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合作，與東協國家簽定反恐的聯盟，特別是美國駐軍中亞，與中亞各國進行軍事合作，都讓「中國」產生美國藉反恐之名，行圍堵「中國」及擴張霸權之時不安感。而中國官方或學者普遍認為，中共已取代前蘇聯成為美國的假想敵，並將戰略中心移至亞洲。只是在現實主義的外交思維上，中共為確保其經濟改革的持續，需要來自美國及西方的資金投資與技術移轉，短期間內，除非雙方有重大衝突，否則中共還是必須與美國維持既競爭且合作的矛盾關係。

另一方面，針對日本在九一一事件後的反應行為，中共認為日本藉反恐主義提出違反日本憲法的法案，並趁機派遣艦隊遠赴印度洋，意圖走向軍事大國，然而為了不影響「中國」追求經濟發展的目標，未來中共對日本的政策，原則上將以推動經貿往來為主，防止日本向美國過度傾斜，並走向軍國主義。

收件：95年10月11日

修正：95年11月07日

接受：95年11月17日

作者簡介

張書瑋，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學士；現就讀於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生。

^{註四} 蔡裕明，「北韓核武變局東北亞安全」，展望與探索，第1卷第3期，2003年，頁91。

^{註五} 邱坤玄，「冷戰後中共與朝鮮半島的權力平衡」，中國事務，第4期，2001年，頁90-102。